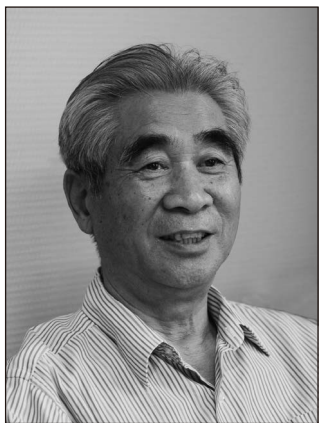


我的建筑师梦

○何玉如（1962 建筑）



何玉如学长

懵懵懂懂地学了建筑

我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家庭，兄弟姐妹六人只靠父亲一人的微薄工资维持一家生计。所以兄弟姐妹中也只有我一人念完大学。初中毕业后，按父母的意愿是要我去读中等专业学校，好早日挑起生活的重担。但是我的姐姐为了支持我上大学，自己小学没有毕业就自愿参加工作来支撑我继续深造。于是我考入了省重点中学，继而进了清华大学。

我受的家教甚严。在为人处世上，父母教我做人要本分，在学业上教我要上进。我也能体谅到父母的艰辛，所以一心读书，从不惹是生非。初中时一度失学后，更懂得发奋努力，学习成绩直线上升，到了毕业时，已经是全班的前三名了。我的母亲不识字，父亲在学业上唯一能教我的是写

毛笔字，小学毕业那年，全县小学生毛笔字比赛，我一举夺魁。也许是书画同源，所以初中时美术课作业也常列前茅。有时还喜欢看小说，我的周记和作文颇为语文老师赏识，以为将来在文学上能有所发展。可是高中时，语文老师对我的文章不屑一顾。我只好改换门庭，专攻数理化，我的数理成绩可以在期中成绩单上出现 100 分，然而语文总在 80 分上下浮动。至今每每动笔写文章，总成一桩艰难之事。

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中，对于未来应该学什么专业，并没有明确的目标。记得考大学报志愿时，偶尔见到一份大学建筑系的介绍。自以为有数理化的基础，又有点画画的技能，在没有任何人的指导下，就懵懵懂懂地报了清华大学建筑系。

在培养建筑师的摇篮中

清华建筑系馆的走廊里经常挂着色彩斑斓的画和建筑效果图，无疑对新生有着强烈的诱惑力——在大学中居然能造就出如此高明的建筑师。第一堂美术课是素描。我来自穷乡僻壤，没有见过大世面，哪里懂得什么明暗交界面，什么要把石膏体画出铿锵有声的质感。记得我们班的王家骅同学画的石膏像，老师称赞它能敲上去“嘭嘭响”。显然，我比那些大城市来的同学，落伍了一大块。那时家里不能供我

任何费用，每月18元的甲等助学金，除了交足伙食费外，只有四五元的零花钱，除了日常用品外，尽量多买点铅笔、纸张，用更多的时间来练、来学。渐渐地到了期末最后一个作业，开始进入了5分的行列。有了素描的基础，从此水彩画的成绩也能保持在前列。

建筑课程设计我似乎也没有太多的天分。看到同学们的设计，都那么有创意，记得二年级时，二班姜中光同学的作业在设计建筑后面衬着一大片抽象的大树，既亮丽又高雅。我总觉得自己没有这样的悟性。但是我很听老师的话，老师改我的图也特别认真，有时“送”一个方案给我，二年级的“餐馆设计”就是我的启蒙老师崔克摄先生手把手地给我改的，于是就能得到好分数。也因为这样，增强了我学建筑的信心。

大学的前四年，政治运动比较多。1957年的反右斗争，天天要看大字报，参加批判会。1958年的大跃进，和同学们一起自建土电厂；大炼钢铁中，居然也炼出了几块所谓的“钢”来；“除四害”时，白天到西山去轰麻雀，夜里进颐和园捣鸟窝。

1959年反右倾，有的同学从老家回来反映农民吃不饱，也召集我们开会批判“右倾”思想；1960年去徐水县搞人民公社规划，为农民设计楼房，让农民过“窝窝头的共产主义生活”。四年下来，回头一看，功课没有学多少，追悔莫及。赶紧奋起直追，“填平补齐”。后两年，一方面有紧迫感，另一方面也开了点窍，老师说我进步比较大，要我报考本校研究生。考研究生耽误了几个月的时间，毕业设计

落后一大块，为此颇受老师照顾。徐伯安老师辅导时给点“偏食”，自己也格外努力，居然毕业设计成绩优秀。后来作为优秀的学生作业被刊载在《建筑学报》上（当时同班的陈衍庆同学任《建筑学报》编辑，大概对我也有一点偏爱吧！）。

我大学六年中，全部课程出现过一次3分，是一年级被大家称为“头疼几何”的“画法几何”这门课。按学校规定：六年中，全部课程必须是4分和5分，只允许出现一次3分，这是评定优秀毕业生的最低条件。其实，我们班优秀的同学很多，尤其是主要的设计课程所显示的才智，比我强得更多。但是，在这“分数挂帅”的年代里，我成了班上的唯一。我勉强获得优秀毕业生奖章，毕业时得到了蒋南翔校长的接见。

原本系里让我读研究生，是想要我研究建筑历史，我感到自己的基础知识不够，有点胆怯，想做点实际工程。于是后来就改为民用建筑教研组的研究生，专题研究图书馆建筑。1964年正值国家图书馆要上马，系里带着我和一个毕业班做方案，系领导刘小石老师曾设想用此设计来代替研究生毕业论文。可惜工程很快又下马了，只好重新写论文。

我研究生期间的导师是汪坦先生。我的研究生学习照例应在1965年毕业，当时全国大学毕业生都要补课，补阶级斗争的课，这还是“最高指示”，否则不准毕业。于是我的学业又延长一年，到农村去参加“四清”工作队。临行前我将毕业论文初稿写完，准备一年之后回校答辩。不料，一年后的1966年6月国内风云突变，“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糊里糊涂地从农

村撤退回来，学校里已经一片混乱，全部瘫痪，哪里还有可能管我的答辩和毕业之事。然而我是学习期满，论文初稿已成，总不能前功尽弃，连个名分都没有。于是我们也“造反”，要求正式毕业。到了年底，高教部颁下一文，批准毕业。这样我就以研究生毕业的名义步入社会，理直气壮地比本科生的工资每月多了6元钱。

想当一名真正的建筑师

在报考大学建筑系时，不少人是冲着梁思成先生的名气报考清华的，想亲聆梁先生的教诲。1963年，在我的研究生学习期间，国际建筑师协会在古巴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我有幸作为学生代表参加了由梁思成先生任团长的中国建筑师代表团。这是我一生中的转折之一。这次国际建协大会中，附设了一个师生会见大会，有三个议题，我是第一个议题的正式代表。会上我奉命阐述了只有人民掌握了政权才能有享受高等教育的权利等等。由于大会的主席团中有梁先生，经他的努力，最终把这个观点列入了决议。为此，我国大使馆对我们学生非常满意。

这次出国，途经苏联和捷克，在英国和加拿大机场也有短暂的停留，在古巴除了首都哈瓦那，其他地区也有所参观游览。我从实际中认识了东欧的古建筑和西方现代建筑，大大开阔了眼界，丰富了感性认识。会议期间，在古巴展出了吉隆滩纪念碑国际竞赛的设计方案。当时国内也通过竞赛选拔出三个方案送展，虽然其中一案（我班陈继辉同学参与的）得了表扬奖，但总体看我国的方案强调传统式的纪念碑，被认为是学院派的设计。而得一、二、

三等奖的方案往往是一种抽象的概念，注重描绘事件的过程，既有空间又有时间的概念。显然，我们和国外有很大的差距，这引起我很大的震动。

这次会议，我国派遣的代表团都是国内建筑界的精英，除了我们三个学生（同济大学的陈励先，南京工学院的齐康和我）外，大都是各地的建筑前辈，这是我拜师的大好机会。代表团里建筑前辈们对我们几个年轻人关怀备至，大到对中外古今建筑的分析，小到生活上的饮食起居。上海的前辈陈植老先生已步入高龄，属虎，整整大我三轮，自居老老虎，亲昵地称我小老虎，之后我每到上海考察，也总是特别关照。我特别崇拜这些前辈，梦想将来虽然不能达到他们的高度，也要以他们为榜样，努力做一名真正的建筑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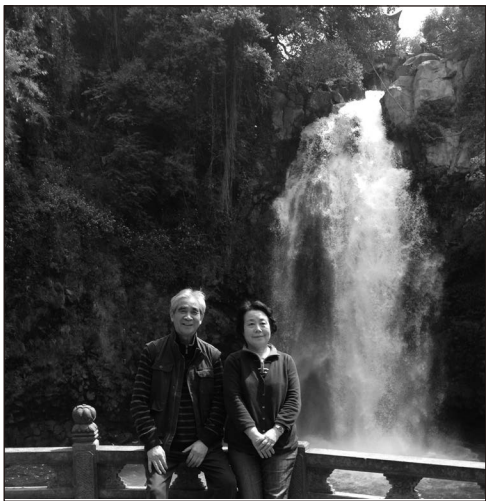
梦想一度破灭

1967年我结束了学校生活，开始建筑设计生涯。应该说进入建工部北京工业设计院，是梦寐以求的地方，是一个理想的工作。原本想死心塌地在这里工作一辈子，偏偏是“文化大革命”对我们这批知识分子不依不饶，工作还不满半年，非下放改造不可。当时设计院里两派斗争正如火如荼，掌权的一派对我这个“异派分子”自然不能视为“己出”，趁下放之机一脚踢出院门。

从1968年到1972年，这大概是我一生中最低谷的四年。我随身带着一个印有“大海航行靠舵手”七个大字红漆木箱，里面装着幸存下来的几本建筑书，开始从内蒙到湖北山区的流浪生活。对于我来说，生活上再艰苦，气候条件再恶劣，无非是

皮肉之苦，而心灵上的悲哀莫过于想当一名建筑师梦想的破灭。

1968年底我到了内蒙古，户口由北京迁出。当时我新婚不久，此一去酷似“苏武牧羊”，真不知何日再能回来。第二年我夫人吴亭莉的单位也开始下放，总算领导照顾可以下放到一处。于是我们开始在内蒙古建起一个家，我们唯一的家当依然是那个“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木箱，工人师傅看我们的家具太少，为我们做了一个同样大小的木箱。以后这一对木箱随我们“航行”到北京。在工地上我当木工，吴亭莉当油漆工，“配合”得很好。既然是建筑工人，总算是与建筑沾点边，也是一丝安慰。不久工地上缺技术员，开始让我接触图纸，有时画一点钢筋下料图，算算用料的多少等。再以后工人师傅居然称我为工长，倒不是我去分配工人做什么，而是看了图纸告诉工人应该怎么做，名副其实的图纸翻译员。既然是技术员，就可以



何玉如、吴亭莉学长夫妇

名正言顺地研究点“技术”。当时工地上要建造一个沉井，如何使沉井在下沉的过程中不偏不斜，我就和工人师傅商量如何在下边设计刃角，在挖刃角边支撑土的时候，将力量分配均匀，出现偏差时又如何去纠正等。由于接触了技术，才开始从积极的角度把我当时所处的逆境看成是有用的社会课堂。例如工地上要拆除一座砖烟囱，这在学校里是没有教过的。我就去请教老师傅，工人告诉我，如何将砖烟囱根部的一侧凿空，边凿边用木枋子支撑，到了其中一侧几乎全部用木枋子支撑着的时候，将木头点燃，烟囱就按照预定的方向轰然倒塌。当然，从现在高科技的角度来看似乎显得土了一点，但这在当时也算是学问了。以前从书本上知道美国已建成的大楼。可以整体位移，我总想利用工地上机会来尝试一下。有一次工地上一个厂房的杯形基础由于放线的误差错了位，要清除掉很困难，我和工人商量，硬是用千斤顶将几十吨重的基础挪到了正确位置。后来我的胃口越来越大，工地上五开间的一座工棚背靠山坡阴冷潮湿，不时有水渗入棚内，我就提出了一个整体移出一米的方案。就这样，我在逆境中居然也找到了乐趣，还交了不少工人朋友。然而，当建筑师的愿望还时时在心中作痛，我还是努力想调出工地，我想即使让我设计一座公共厕所，盖起来，也算是没有白上了建筑系。

1972年，吴亭莉的原单位一机部第八设计院按“1号通令”迁往内地，将她召回。不久将我调到一机部八院的调令也随之到了“二汽”工地。

终于当上了建筑师

从湖北二汽的工地，调到湖南湘潭一机部第八设计院，从地域条件来说没有多大变化，只是从山区的三线调到平原的三线。但是工作性质明显不同，开始进入了脑力劳动的行列，因而到了八院只要是设计工作，我就会无条件服从。八院的领导看准了这一点，就要我改行搞结构设计。当时我很自信，无非是学吧，况且在工地上蹲了四年，接触的结构问题也不少，搞结构也难不倒我。于是开始学会了单层工业厂房的排架计算等。经过半年，终于有一次一位老工程师审核我的计算书，发现柱子的配筋整整少了两大根。回想刚参加工作时，老工程师曾对我讲起过某个工业厂房的钢屋架，由于计算中漏了积灰荷载一项，而引起厂房倒塌的事故，我开始后怕了。要么认认真真从结构专业的基础知识开始补课，要么退回到自己的专业。正好当时北京有一项工程的科研楼，建筑造型要求比较高，一时没有建筑专业的合适人选，情急之中，选中了我。从此我又开始了建筑设计的生涯，而且逐渐被领导所赏识。第八设计院是电机行业的专业设计院，大量的工业厂房设计。偶尔有一点厂前区，或是少量的民用建筑。即便如此，凡有民用建筑设计总是照顾我的特点，让我去完成。

深圳特区开放的初期，八院组织一支小分队去开拓业务。开始时进入特区的设计队伍并不多，因而小打小闹的工程项目并不少。到了1981年设计队伍大量涌入，中央一级专业设计院组织了联合设计公司，在公司中我也负责一项规模较大的高层住宅的设计任务，因此自以为也设计过大型民用建筑。然而更大的工程，与民用

建筑设计院相竞争时，明显地感到势单力薄。这刺激着我继续归队的强烈愿望，尽管我对八院的领导怀有感激之情，对同事依依不舍。八院的领导甚至一机部的领导一再挽留我，但在八院长久下去始终会感到圆不了我的建筑师之梦。

同学们对我的处境非常关心，纷纷伸出援助之手。记得时任西藏建设厅副厅长的同班同学龚耀祖，曾征求我意见是否可以调到拉萨去，当时我考虑全家在北京，恐怕不适应当地的环境，婉拒了。后来，任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的同班同学吴观张建议，以首都宾馆现场设计缺人为由，将我借调过去。同时，新任院长叶如棠同学用蝇头小楷写了一份请调我去北京院的报告，给当时的张百发副市长，引起张副市长的高度注意。正在这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同班同学倪天增，突然来信称已经报请上海市有关部门调我到华东院（现上海现代设计集团），并同时申请到四个户口指标，全家可迁上海。此信被吴观张院长转送给张副市长的秘书、我的学长林寿同学，林学长马上办妥了同意调入北京的批复。于是在1984年我很顺利地正式调入了北京院。我终于实现了当一名建筑师的梦想。每每想到这里，我总是不能自己，心里暗暗下决心，只有努力工作来报答所有帮助过我的同学和朋友。

为建筑师铺路

从1992年起，我在北京院当了十年首席总建筑师。2000年被建设部评为“全国建筑设计大师”，后来两次申报中国工程院院士，都当了“分母”。领导解释是因为我亲自主持的工程太少，也有人认为

当总建筑师不能自己主持工程,有点吃亏。对此,我不大以为然,一个千人以上的设计院,每年所要关注的重点工程就有几十项,从宏观上讲总建筑师就是要做点铺路的工作。

回顾我自己走过的历程,得以安慰的除了整个院在技术上有了进步,对社会作出了贡献外,在培养人才方面我是尽了很大努力的。我自己坎坎坷坷地当上了建筑师,深知其中的苦衷。我要尽可能为年青人实现梦想开绿灯、铺道路。在北京院实践的机会比较多,但相对理论基础比较弱,院里的业务建设也有一定的局限性,系统性差,因而很多年轻人工作几年后想系统地深造一下,充充电。我积极争取年青人派送到法国留学,去清华深造等。此外,每个企业为保障自己的利益,会作出一些保护性的规定,如大学毕业生一旦进院必须作出服务五年的承诺。但是有些年青人进入北京院后,尚有更高的发展空间,我为这样的年青人开放绿灯不下十几人。有一位年青建筑师来院不久,感到需要打下更深的基础,而且已被香港大学录取,我和人事部门协商后“放行”。后来她继香港大学之后,又去哈佛深造,回国后成了北京市政府的特聘专家。有的在外留学遇到困难,我也曾写信鼓励他们坚持。还有一些人虽然离开北京院,但在其他岗位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取得骄人的成绩,我同样会感到欣慰,也为北京院曾经培养过他们而感到骄傲。

我的后梦想时期

2002年一大批奥运工程降临的时候,我自己清楚地意识到不可能担起如此重的

担子,而且已经超越法定退休年龄三年了,经过三次申请,我从一线岗位上退了下来。退休以后,大概是出于社会上的惯例,领导总会安排一个“过渡时期”,于是就产生了我的工作室。主观而言,也是我们蒋校长要求我们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我尚欠不少年;再则,母校的吴良镛先生一再邀请我与他合作设计,于是我又开始画图。我也试图在吴先生的大旗下,也许在搞设计时非专业的干扰因素会少一点,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实现理想一点的设计。

在吴先生的带领下,我完成了三座博物馆的设计,其中南通博物馆,在建国60周年时被评为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创作大奖。此外,我的工作室一再强调重点在于培养人,而不以产值为宗旨。但是,现实总是“残酷”的,梦想毕竟是梦想,2009年当我满70周岁时,自动从工作室退下来了。

现在,我在家重新拾起童年时的书法爱好,几乎每天习字成瘾。居然还自得其乐地抄写我夫人的诗作,自费出版了《轻诗淡墨集》小册子。我为自己书写了一幅行书:“清远闲旷,虽古稀犹能书字,幸免俯仰逼迫之苦,得以读书,幸也。”书房里挂着一幅大字“散淡出尘”,并注释陆游的词:“悟浮生,厌浮名,回视千锺一发轻,如今心太平。”这些,就是我后梦想时期的写照。

回顾我的历程:少时爱好写毛笔字,后来学建筑学,想当建筑师,坎坎坷坷当成了建筑师,到老又回到原点——习字,但只是消遣而已。